

辞目  
汉英  
对照



THE MODERN FUTURES DICTIONARY

# 现代期货 大辞典

主编 刘迎秋



辞目

---

汉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

对照

---

---

# 现代期货大辞典

THE MODERN FUTURES DICTIONARY

---

主 编 刘迎秋

副主编 董振明

剧锦文

王 健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魏海源  
装帧设计：王师颀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期货大辞典/刘迎秋主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11  
ISBN 7-01-002459-6  
I. 现…  
II. 刘…  
III. 期货交易-词典  
IV. F713.1-61

**现代期货大辞典**

(辞目汉英对照)

XIANDAI QIHUO DA CIDIAN

主 编 刘迎秋

副主编 董振明 剧锦文 王 健

\*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0 插页: 4

字数: 1,045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01-002459-6/F·566 定价: 175.00 元



1992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上海金属交易所



1993年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上海金属交易所



1992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  
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领导陪同下  
视察苏州商品交易所



1994年10月，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理事长威廉·保罗斯基(左二)、总裁约翰·桑德罗(右一)访问苏州商品交易所



1995年9月20日，日本关西农产品交易所理事长岛崎一男一行访问郑州商品交易所，并签订“友好交易所”协议



1992年7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  
察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  
场（后定名为中国郑州  
商品交易所）

1992年7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  
深圳有色金属期货联合交易所并挥笔题词



1992年11月19日，加拿  
大温尼伯商品交易所总裁西门  
斯访问深圳有色金属期货联合  
交易所，郑元亨总裁向客人介  
绍交易所情况



1994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视察重庆商品交易所并题词



1994年1月11日,李铁映在视察重庆商品交易所时,  
与出市代表亲切交谈

1994年3月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左四)等领导视察北京商品交易所,并参观了技术部、结算部及交易大厅



1995年2月14日,香港证监会主席彭定邦一行访问北京商品交易所

1995年5月12日,国家内贸部长陈邦柱(右二)参观视察大连商品交易所





1995 年 5 月 19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向  
贫困地区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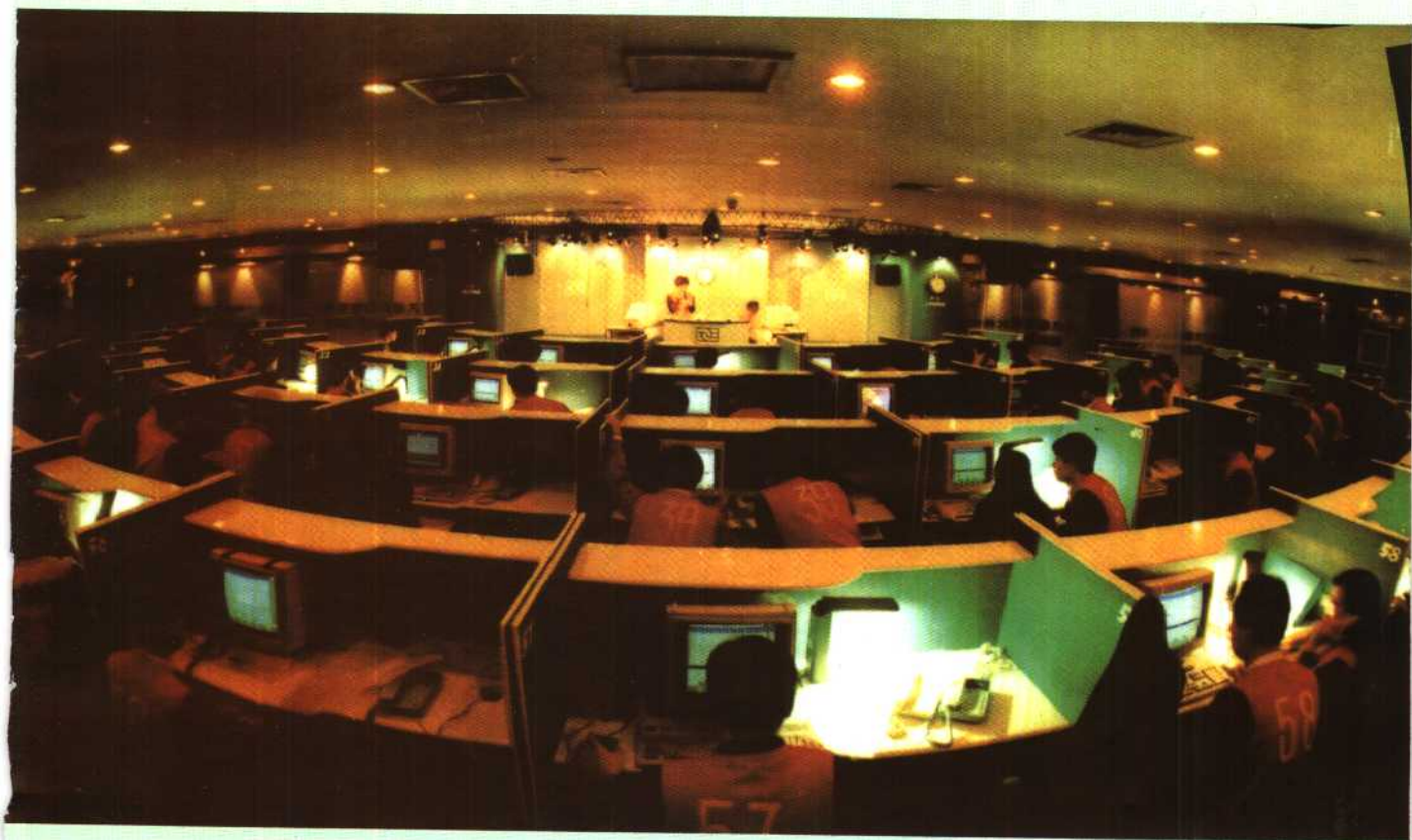
1995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视察上海粮油商品交易  
所



1995 年 10 月 26 日,上  
海粮油商品交易所总裁  
贺涛与日本关西农产品  
交易所理事长岛崎一男  
签订友好交流协议书



1995年11月2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  
周道炯(右二)视察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



井然有序的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



上海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灯火辉煌

上海商品交易所巍巍壮观的交割仓库



60260/7 11

## 《现代期货大辞典》高级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
|-----|-----|-----|-----|-----|-----|-----|
| 马 洪 | 于光远 | 王洛林 | 刘国光 | 刘鸿儒 | 谷书堂 | 吴敬琏 |
| 杜 岩 | 张卓元 | 陈宝瑛 | 高尚全 | 董辅初 | 戴园晨 |     |

## 《现代期货大辞典》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李剑阁  
副主任 乔 刚 刘迎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
| 马建堂 | 孙志新 | 刘世锦 | 刘迎秋 | 乔 刚 | 李剑阁 |
| 李经谋 | 余国聪 | 孟庆山 | 武小强 | 郑元亨 | 贺 涛 |
| 姚 刚 | 钟福棠 | 姜丽华 | 夏 峰 | 唐志新 | 陶 珩 |
| 董振明 |     |     |     |     |     |

## 《现代期货大辞典》编委会

主 编 刘迎秋  
副主编 董振明 剧锦文 王 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
| 王 健 | 田 源 | 刘迎秋 | 刘瑞忠 | 刘霞辉 | 邢建平 |
| 陈郢山 | 陈争平 | 张延衡 | 杨素梅 | 李 俊 | 贺 强 |
| 翁林方 | 徐文元 | 剧锦文 | 常 青 | 董振明 |     |

## 《现代期货大辞典》特邀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
|-----|-----|-----|-----|-----|-----|-----|
| 马惠赢 | 王常青 | 王 健 | 刘迎秋 | 邢建平 | 李 雯 | 李 荒 |
| 李清香 | 李学峰 | 何 健 | 张允文 | 张炳富 | 邵长义 | 陈争平 |
| 杨挽涛 | 庞介民 | 贺 强 | 阁明俊 | 赵立华 | 郭士英 | 剧锦文 |
| 曹 宇 | 董振明 | 韩 虹 | 魏 红 |     |     |     |

# 序

李 剑 阁

期货市场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如同国外绝大部分期货市场，它也曾难以避免地经历了初生时的阵痛和襁褓中的磨难。在它蹒跚学步的五年中，前期发展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经过后两年的规范整顿，我国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原本交投混乱的局面大为改观，非法境外期货交易基本销声匿迹，期货交易所和经纪公司的数量得到控制，布局趋向合理。目前政府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规范市场的各项措施陆续实施，清理整顿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整个期货市场正在从无序转向有序，从混乱步入正轨。期货市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当我国期货市场在实践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时候，理论界和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一批宣传和普及期货交易知识的书籍，这对于推动人们对期货市场的了解和认识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其中不少书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材料、案例直接取自于国外和港台书报，对于其中的谬误未作修正，难免以讹传讹；二是大部分概念、范畴和术语源自于众多译者之手，缺乏统一的定义和科学的内涵，易于引起误解和歧义；三是大部分书籍体例、条目的设计和编排不尽科学、合理。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现代期货大辞典》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上述之不足。这部辞典共设 2000 余个条目，规模不可谓不大；历时五年，精益求精，作者的精神与态度值得推崇；全部辞目汉英对照，内容力求详尽，在期货研究领域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三种辞目检索方法，新颖别致，方便读者。上述种种均值得称道。

我认为，这部辞典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推动我国期货市场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期货交易实务的规范。因而，我乐意为之作序，并希望期货理论园地里的这株新葩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

# 前言

在一部大辞典的前言中，本不应当谈与大辞典无关的理论问题和市场建设问题。但是，由于这部《现代期货大辞典》的研究、编写与出版，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中国的期货市场实践，以后与中国期货市场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因此，在开篇首先对中国近年来的期货市场实践与理论实践做一番分析与阐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过程的简短回顾

对于当代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创建和发展期货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虽然如同我们在《现代期货大辞典》的附录“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中所追溯与描述的那样，早在清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期货市场的萌芽及其初级形态，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并不是在那时产生的。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也仅仅是建立起了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交易所，而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中国的、真正的和现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是在中共十三大以后开始酝酿、1990年开始实质性起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 1. 中国发展期货市场的理论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其一是1984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其二是1988年初秋发生了一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震惊了世界的“抢购风潮”。这次风潮是对当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构造间内在冲突的提示与总结。经过这场风潮以后，人们不得不反思，连续数年反复出现所谓农民“卖猪难”、市民“买肉难”、企业间为争夺某种原料而展开各种“大战”、市场震荡一浪超过一浪之类的现象，其症结究竟何在？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理性的、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回答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只有现货市场而无期货市场，没有形成通过期货调节现货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调控体系，现行体制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实践迫切需要研究与发展期货市场。1988年2月10日李鹏总理写信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这一指示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展开，标志着中国期货理论研究工作初步列入日程。

期货市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普遍认同，随

之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到1989年,已经有大量关于期货市场和我国需要发展期货市场的文章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有关专著也相继问世。不过,当时的理论研究还是初步的,多数论著还注重于推广传播期货知识、阐述我国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 2. 中国期货市场得到恢复与初步发展的阶段(1990~1993年)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理论准备之后,我国的期货市场开始进入试验阶段。当时,这种试验首先是从建立大宗商品批发市场开始的。例如,1989年10月12日黑龙江省首先在哈尔滨建立了运用期货机制的省际粮油批发市场。1990年10月12日,在总结前期设计与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原国家商业部和河南省政府在郑州联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运用期货机制的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继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省际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开业。这些粮食批发市场都积极利用期货机制,表现出强烈的从现货市场过渡到期货市场的倾向。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SME)宣告成立,并于次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的第一天即1992年1月18日正式开业。这是在总结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中国第一家以金属期货合约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期货交易所。交易所上市的品种有铜、铝、铅、锌、锡、镍、镁、铋等有色金属。不过,当时该交易所所采取的还是现货交易、远期合同交易和标准期货合约交易同时并存的交易方式。

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并开业。该交易所开业的当天成交量就超过了50亿元,李鹏总理为交易所开业剪了彩。各地资金纷纷大量注入上海,这种情况大大刺激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以及广大投资者。由于人们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特别是受部门与地方利益的驱动,在无统一管理规则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创办各种各样的“期货交易所”。甚至煤炭、西瓜等等,也都有了“期货交易所”。到1993年底,全国各类期货交易所已达数十家,如果加上具有办成期货交易所倾向的各种交易市场,则有权威人士估计其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家。

比期货交易到处开花的来势还大、还早的是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的创办与发展。在还不够了解和通达期货交易理论和国际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各地首先由从事国际期货交易入手,成立了许多期货经纪公司,并大量聘用外国期货经纪人。在中国人不大懂得国际期货业务、更不了解国际期货市场的情况下,不少外国人开始利用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无知,欺骗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和广大投资者,以做国际期货为名圈套我国的资金。有名的“百事高期货咨询公司坑害客户事件”和南京上百家客户冲击、捣毁金中富国际期货经纪公司的“金中富事件”以及鞍山东诚国际期货经纪公司所聘用的外国经纪人卷走公司客户资金等事件,就是在此间发生的。

与市场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相共生,在这一时期有关期货市场的论著也开始增多,其中粗制滥造的作品也不为鲜见。它充分表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科学系统的期货交易理论与政策又远远跟不上期货市场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期货市场一经恢复就出现过多过滥的局面,是耐人寻味、值得认真总结的。

## 3. 中国期货市场在规范中寻求发展的阶段(1994年~现在)

从1994年初到现在,我国的期货市场经历了一个过度投机烽火连天、违规事件和恶炒期货风波此起彼伏,政府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和不断用规范来促进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阶段。例如,1994年初首先发生了对6.5线材期货的恶炒,接着又发生了发端于1994年、到

1995年初基本形成气候、最后于1995年2月23日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国债期货“327风波”，继而对上海小麦期货的恶炒也于同年3月初达到了高潮，后来是借中远期合同变相进行期货交易的机构行为泛起，于是在制止国债投机后又出现了上海“3·29胶合板风波”，1995年5月11~12日上海国债市场再次掀起“319风波”，同年6月天津红豆期货也掀波浪，长春联交所则因管理失误而产生了交易所定点仓库与部分会员勾结、用空头玉米标准仓单打入交易所牟取暴利的丑闻，不久广东金创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再演利用籼米7111合约进行市场操纵、蓄意违规谋利的恶作剧，如此等等，真可谓波涛汹涌、骇浪涛天。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规范。

针对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混乱，国务院办公厅曾于1994年5月16日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标志着对已成立的期货交易所的全面审核、对期货交易范围的严格限定、对各类期货经纪公司的重新审批、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严格控制、对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严格查处的开始。此间，政府主管部门通过组织业内人士和有关部门以及广大学者参加讨论早已起草好的《期货交易暂行条例》、《期货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期货经营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期货从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境外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等，对于推动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也起到了进行正面理论教育和实施具体政策指导的作用。经过一年左右的重新登记与整顿，撤销了一大批不合格的期货交易所，淘汰、关闭了一大批不合格的期货经纪公司，取缔了所有已经查出的非法经纪公司和地下经纪公司，先后暂时中止了诸如白糖、线材、粳米、菜籽油、国债等品种和境外期货的交易。另外，中国证监会也一再发通知、亮黄牌，有关部门对万国证券公司实施严厉制裁措施，期货管理部门将广东金创期货公司清除出场，如此等等，这类强硬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强化了市场规范。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即可发现，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在理论准备不够充分、制度构造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之初曾经有过中央政府的推动，但这种推动很快就演变成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偏好，生产经营者并不构成中国期货市场创办人或发起人的主体。这就决定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名义上非盈利性、实际上却充满盈利冲动的特点。它表明，中国期货市场从产生之时就既与欧美不同，又与香港不同。在欧美国家，期货市场的创建与政府无关，作为市场核心的交易所大都是生产经营商的联合体。例如，英国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最初于1776年创立时，就是首先由一些大的金属生产经营商发起组建的，当时创办交易所的根本目的是寻找一种能够给生产经营者规避金属价格波动风险的“预约价格”方式。因此，它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中介。与此相联系，当时由17位董事组成的交易所管理董事会中只有一位执行总裁从交易所取得报酬。再比如，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初也是由82位谷物生产经营商于1848年组建起来的世界上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该交易所完全是由于农场主和谷物商为寻找一种能够防止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预先销售”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事后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与欧美不同的是香港。香港期货交易所是在政府于1974年首先发动讨论和酝酿制定法案的基础上组建的。在香港，先是由政府认可和发动，然后才是具体实施组建期货交易所，并直接以此来保持和加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比一下中国的期货市场，从几年来走过的路程来看，大致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中国的地方和部门颇有类似于香港政府的倾向，因而它们成了组建期货市场的主要推动者；二是中国的期货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生产经营商为主体构造的，因而一经建立，它就具有特别强烈的内在投机倾向；

三是中央政府从开始主动到中期变得被动后退，因而在市场发展中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市场建设监督者”和“消防队”的角色。

## 二、中国期货市场为何经常处于过度投机的状态

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某种“被动性”，可能与人们对要不要发展期货市场和怎样发展期货市场的认识还未彻底解决有关。在《中国期货市场：起步·转换·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2月版）和《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1月版）等论著中，我们曾经对此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论证。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方面，不能把期货市场的功能估计过高，甚至认为它可以调节和支配整个现货市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基础产品领域，包括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生产与流通领域，期货场所特有的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是其他任何手段与机制都无法替代的。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期货市场首先是一种“虚货”市场。标准合约在期货市场上先行流通与反复转让，是对现货市场供求双方最终承担人的多重和多向选择的过程。期货场所给定的，实际上是现货交易的结果；现货场所给定的，则实际上是期货交易的前提。因此，只有加上期货市场以后，“国家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这样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才能够算是完整的和可能是有效率的。从这个角度看，那种关于期货市场能否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异化的各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不过，把期货市场当作异己，也可能与当前中国期货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是过度投机密切相关。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期货市场上几乎到处都是投机和过度投机，人们几乎看不到和感受不到期货市场的保值功能？目前，中国期货市场还基本上是一个投机市场，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期货市场全面健康运行的现货市场基础还不充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这样一种体制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各类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目前，虽然绝大部分现货产品已经全面市场化或基本市场化了，但是，也还有相当比重的现货产品没有市场化。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还基本上处于“二元化”和“双重性”的状态。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还基本上不是、或者说还主要不是市场，“市场”与“非市场”间的选择与替代必然会对人们的利益追求和实现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期货市场还不具备全面健康运行的现货市场基础。

第二，期货市场主体行为还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如前所述，中国现行体制还是“二元化”的和“双重性”的。只要传统体制还在起主导作用，那么，不是靠制度而是靠“长官意志”的管理行为就会时有发生。而只要传统体制还在发生作用，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就无法得到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的有效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运行也就必然是震荡型的，投资主体的投资预期也就必然是不稳定性的，因而反复出现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不断诱发市场主体的投机和过度投机，甚至市场主体经常试图通过投机牟利的倾向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期货市场本身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如前所述，中国的期货市场建设既与欧美不同，也与香港不同。而与香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香港期货市场建设是先由政府发动讨论、进行立法，然后再由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要求在组建期货交易所的基础